

三聯人文書系

陳平原 主編

王德威 著

一九四九：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

ISBN 978-962-04-2802-9



9 789620 428029



聯合出版集團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HKS 68.00

<http://www.jointpublishing.com>

陳平原 主編

二聯人文書系

王德威 著

一九四九：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



三聯人文書系

王 編 陳平原

責任編輯 姚少沙

書籍設計 彭若東

書 名

著 者

出 版

一九四九 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

王德威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一〇六五號一三〇四室

Joint Publishing (H 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

二〇〇八年十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大三十二開 (141×210 mm) 二五六面

ISBN 978 962 04 2802 9

© 2008 Joint Publishing (H 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香港發行

印 刷

版 次

規 格

國際書號

總序

陳平原

老北大有門課程，專教「學術文」。在設計者心目中，同屬文章，可以是天馬行空的「文藝文」，也可以是步步為營的「學術文」，各有其規矩，也各有其韻味。所有的「滿腹經綸」，一旦落在紙上，就可能或已經是「另一種文章」了。記得章學誠說過：「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我略加發揮：不僅「良史」，所有治人文學的，大概都應該工於文。

我想像中的人文學，必須是學問中有「人」——喜怒哀樂，感慨情懷，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心境等，都制約着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另外，學問中還要有「文」——起碼是努力超越世人所理解的「學問」與「文章」之間的巨大鴻溝。胡適曾提及清人崔述讀書從韓柳文入手，最後成為一代學者，而歷史學家錢穆，早年也花了很大功夫學習韓愈文章。有此「童子功」的學者，對歷史資料的解讀會別有會心，更不要說對自己文章的刻意經營了。當然，學問千差萬別，文章更是無一定之規，今人著述，盡可別立新宗，不見

得非追韓摹柳不可。

錢穆曾提醒學生余英時「鄙意論學文字極宜着意修飾。」我相信，此乃老一輩學者的共同追求。不僅思慮「說什麼」，還在斟酌「怎麼說」，故其著書立說，「學問」之外，還有「文章」。當然，這裡所說的「文章」，並非滿紙「落霞秋水」，而是追求佈局合理、筆墨簡潔，論證嚴密，行有餘力，方才不動聲色地來點「高難度動作表演」。

與當今中國學界之極力推崇「專著」不同，我欣賞精彩的單篇論文，就連自家買書，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專題文集，而不是疊床架屋的高頭講章。前年撰一《懷念「小書」》的短文，提及「現在的學術書，之所以越寫越厚，有的是專業論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眾多陳陳相因的史料或套語來充數」。外行人以為，書寫得那麼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功夫。其實，有時並非功夫深，而是不夠自信，不敢單刀赴會，什麼都來一點，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紅皂白，眉毛鬍子一把抓，才把書弄得那麼臃腫。只是風氣已然形成，身為專家學者，沒有四五十萬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類似的抱怨，我在好多場合及文章中提及，也招來一些掌聲或譏諷。那天港島聚會，跟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陳翠玲偶然談起，沒想到她當場拍板，要求我「坐而言，起而行」，替他們主編一套「小而可貴」的叢書。為何對方反應如此神速，原來香港三聯向有

出版大師、名家「小作」的傳統，他們現正想為書店創立六十週年再籌畫一套此類叢書，而我竟自己撞到槍口上來了。

記得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九三二年出版，也就五萬字左右，錢鍾書對周書有所批評，但還是承認「這是一本小而可貴的書，正如一切的好書一樣，它不僅給讀者以有系統的事實，而且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稱周書「有系統」，實在有點勉強，但要說引起「許多反想」，那倒是真的——時至今日，此書還在被人閱讀、批評、引證。像這樣「小而可貴」、「能引起讀者許多反想」的書，現在越來越少。既然如此，何不嘗試一下？

早年醉心散文，後以民間文學研究著稱的鍾敬文，晚年有一妙語「我從十二三歲起就亂寫文章，今年快百歲了，寫了一輩子，到現在你問我有幾篇可以算作論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如此自嘲，是在提醒那些在「量化指標」驅趕下拚命趕工的現代學者，悠着點，慢工方能出細活。我則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或許，對於一個成熟的學者來說，三五篇代表性論文，確能體現其學術上的志趣與風貌，而對於讀者來說，經由十萬字左右的文章，進入某一專業課題，看高手如何「翻雲覆雨」，也是一種樂趣。

與其興師動眾，組一個龐大的編委會，經由一番認真的提名與票選，得到一張左右支

細的「英雄譜」，還不如老老實實承認，這既非學術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個興趣廣泛的讀書人，以他的眼光、趣味與人脈，勾勒出來的「當代中國人文學」的某一側影。若天遂人願，舊雨新知不斷加盟，衣食父母繼續捧場，叢書能延續較長一段時間，我相信，這一「圖景」會日漸完善的。

最後，有三點技術性的說明 第一，作者不限東西南北，只求以漢語寫作，第二，學科不論古今中外，目前僅限於人文學，第三，不敢有年齡歧視，但以中年為主——考慮到中國大陸的歷史原因，選擇改革開放後進入大學或研究院者。這三點，也是為了配合出版機構的宏願。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

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目錄

序	001
傷痕書寫，國家文學	007
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	075
歷史與怪獸	107
歷史，記憶，與大學之道：四則薪傳者的故事	177
作者簡介	244
著述年表	245

序

二十世紀中期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動盪不安的一段時期。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佔據大陸，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中國文學自此一分為二，形成兩個傳統；這兩個傳統各自宣揚其政治立場與美學標準。從晚清「新小說」興起以來，中國文學與政治的關聯已經十分緊密，但是一直要到世紀中期，書寫才終於轉換成政治行動，既向作家求索墨水，也向作家求索血水。

為了記錄中國分裂所帶來的種種影響，世紀中期的中國作家重新打造了一種「傷痕類型學」(a typology of scars)。我曾描述一九四九年以前，作家和讀者如何運用「傷痕」構成一種隱喻，體現國家在追尋現代性過程中被斬傷、撕裂的遭遇。我認為，早在魯迅觀看中國間諜被砍頭的回憶文字裡，已經銘刻了一種傷痕，這傷痕既是暴力施加於身體的見證，也是暴力的「文本」表徵。傷痕是傷口結疤後留下的生理痕跡，也是身體用以證實、同時也告別傷害的一種方式——不論這傷害是人為的還是意外造成的。

傷痕是一種記號，指向身體非經自然的割裂或暴露，最終又得以痊癒、彌合的痕跡。

話雖如此，只要傷疤的痕跡存在，人們就會記起暴力的曾經發生。隱含在傷痕裡的是一項肉體證據，指向身體曾經遭受的侵害，指向時間的流程，也指向一個矛盾的慾望——一方面想要抹銷，一方面卻又一再重訪暴力的現場。在檢視個體的傷痕的同時，記憶被喚醒，一個隱含的敘事於焉成形。

一九五〇年代，中國政治地理面臨着再度被割裂的情勢，此時興起的「傷痕類型學」於是有了國家的向度。對許多從大陸逃到台灣與香港的作家來說，在這樣一個歷史時刻書寫，意味着悼念國土的淪喪，也意味着刻劃流離失所的創痛。至於支持新共產政權的作家，書寫則代表一種回憶——回憶在國民黨政權治下的苦難，並預告在社會主義的天堂裡，所有苦難都會消弭於無形。無論如何，這兩大作家陣營都以傷痕——肉體的創傷——為號召，凸現國家分裂的歷史現實，鋪陳一個深受傷害的表意系統。

值得注意的是，傷痕敘事如何成為這一時期建構或修補國家神話的要素。經演義傷痕，作家不只鞏固了這個或那個政權，同時也建立一套說法，為自己，也為讀者，提供安身立命之道。他們仍然相信，意識形態真理可以藉由敘事行為來確認，國家歷史的合法性可以藉由開國、復國的神話來底定。我的論點是 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作家念茲在茲的傷痕敘事產生了種種相互矛盾的張力，而這些張力要到一九八〇年以後才浮上檯面，成為另

一代作家探討的主題。

這本文集所收錄的四篇文章對傷痕書寫和國家文學提出不同角度的解讀。〈傷痕書寫，國家文學〉對海峽兩岸三地（大陸、台灣、香港）在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文學與政治，作出較全面的觀察。我認為這一時期的小說固然負載着當代政治的種種痕跡，但如果不把這些小說與五四文學傳統連接，我們就無從瞭解其複雜意義。儘管共產與反共小說家都認為自己為現代文學開創新局，他們其實無法擺脫上一代的「革命詩學」。他們是晚清以及五四傳統那股黑暗力量的繼承者。撇開明目張膽的政治干預不談，這種革命詩學的內爆正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事實。

〈重讀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則討論張愛玲居港期間的兩部政治小說，《秧歌》與《赤地之戀》。這兩部作品雖有明確的反共主題，但張愛玲對亂世的觀察，遠遠超過表面的政治標籤。《秧歌》中的飢餓政治學尤其讓我們深思。半個世紀之後，我們應該跳出狹義的意識形態限制，重新體認張愛玲所處的時代，和她冷冽的歷史感喟。

〈歷史與怪獸〉以五十年代大陸赴台作家姜貴的《今檣杌傳》為出發點，嘗試勾勒晚明以來說部對「惡」的歷史想像之一端。遠古傳說中的檣杌由怪獸，到魔頭、惡人、史書、小說的轉變，是足以說明中國文明對歷史、暴力、敘事想像的一端。有鑒於歷史中的

暴力層出不窮，我們必須尋思：歷史是對怪獸也似的暴力的記錄，或者竟是其體現？我們對歷史與怪獸的關聯，是戒慎恐懼，還是視而不見？這些問題到了二十世紀變得更為迫切。因為在一個嚮往啓蒙革命的世紀裡，暴力的怪獸早以更細膩的方式，深入我們生活的肌理間，而我們卻可能居之不疑。

〈歷史，記憶，與大學之道：四則薪傳者的故事〉則藉四位知識分子作家——京派詩人何其芳，魯迅眼中「中國最傑出的抒情詩人」馮至，新儒學巨擘唐君毅，「幽默大師」林語堂——在二十世紀中期的經歷，探討歷史風暴中知識分子何去何從的處境。戰亂和政爭將他們拋出原有的生命軌道，讓他們對家國命運有了刻骨銘心的感受。發為文章，他們顯現與當下、與歷史對話的衝動。過去應該如何被留付記憶？記憶應該如何啓發未來？書寫成為這些知識分子感時知命的憑藉，也成為想像、扭轉歷史的嘗試。本乎此，何其芳為共產主義的天啓作見證，馮至思考人存在的本質意義，唐君毅以復興儒學道統為己任，林語堂則尋求天下一家理想實現的可能。

新的世紀裡，海峽兩岸的政治局勢又有了柳暗花明的轉變。回顧過去一甲子的風風雨雨，能不令人感慨。就此我們檢討一九四九年所帶來的歷史裂變和傷痕書寫，正是此其時也。我們必須叩問：傷痕與國家機器的關係何在？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傷痕論述與國家文

學，還有更重要的，在告別傷痕的同時，我們如何檢討國家文學，以免成為下一個時代的「預知」傷痕紀事，

傷痕書寫，國家文學

二十世紀中期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動盪不安的一段時期。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佔據大陸，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中國文學自此一分為二，形成兩個傳統，這兩個傳統各自宣揚其政治立場與美學標準。從晚清「新小說」興起以來，中國文學與政治的關聯已經十分緊密，但是一直要到世紀中期，書寫才終於轉換成政治行動，既向作家求索墨水，也向作家求索血水。

為了記錄中國分裂所帶來的種種影響，世紀中期的中國作家重新打造了一種「傷痕類型學」(a typology of scars)。我曾描述一九四九年以前，作家和讀者如何運用「傷痕」構成一種隱喻，體現國家在追尋現代性過程中被斲傷、撕裂的遭遇。我認為，早在魯迅觀看中國間諜被砍頭的回憶文字裡，已經銘刻了一種傷痕，這傷痕既是暴力施加於身體的見證，也是暴力的「文本」記號。傷痕是傷口結疤後留下的生理痕跡，也是身體用以證實，同時也告別傷害的一種方式——不論這傷害是人為的還是意外造成的。傷痕是一種記號，指向身體非經自然的割裂或暴露，最終又得以痊癒、彌合的痕跡。話雖如此，只要傷疤的痕跡存在，人們就會記起暴力的曾經發生。隱含在傷痕裡的是一項肉體證據，指向身體曾經遭受的侵害，指向時間的流程，也指向一個矛盾的慾望——一方面想要抹銷，一方面卻又一再重訪暴力的現場。在檢視個體的傷痕的同時，記憶被喚醒，一個隱含的敘事於焉成形。〔一〕